




Laoshe Yu **老舍与**
Zhongguo Xiandai Zhishifenzi De Mingyun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傅光明 著

本书得到第42批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特此致谢。

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

傅光明·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傅光明

1965年生于北京。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现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常务副主编、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等。著有《未带地图，行旅人生》、《现代文学梦影拾零》、《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合作）、《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等。译有《古韵》、《观察中国》、《两刃之剑：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小说》（合作）、《现代中国与西方》等。



现代文学研究平台系列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总 序

2006年,教育部批准聘任王德威为复旦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领衔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我想说,这是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刻。它对于提升我们学科的品质,加强国际学术对话和交流,创建一流学科,直接起了推动的作用。

我只想举几个例子,说明德威兄对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2007年春,德威兄到任以后,着手筹备一系列有影响有质量的国际学术会议。2008年6月,哈佛大学东亚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等单位联合举办“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教材教学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和讨论了海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教材建设,这是一个历来被人疏忽、又能够引起许多话题的主题,给人的启发可以想见;10月,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张新颖、张业松、严峰、李楠等教师应邀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参加“呈现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德威兄的精心安排下对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斯理学院等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以集体的形象展示于国际同行的面前;2009年1月,哈佛大学东亚系、台湾“中央研究院”、复旦大学古代文学中心联合举办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外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重要学者都参加了会议;3月,哈佛大学东亚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和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在香港联合举办“中国当代文学6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两岸三地作家王蒙、王安忆、朱天文、北岛、黄春明、严歌苓、平

路、钟晓阳等出席了会议，成为香港学术界一件盛事；2010年6月，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等单位联合举办“新世纪文学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的哈佛中心和复旦大学举行，邀请了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骆以军等知名作家和一批年轻作家同登讲堂，商量探讨新世纪十年的文学，会上高潮迭起，新见纷纭，直接推动了新世纪文学的研究……这些学术活动都有两岸三地的重要学者、欧美日本的汉学家等参与研讨，而德威兄是这些学术活动的灵魂，从策划主题到组织人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不仅如此，他把长江学者的科研经费完全地奉献出来，用于补贴会议费用和邀请复旦教师出国之用；还不仅如此，每次学术活动中，他都带头发表新的学术论文，以卓越见解引领学术前沿风气……身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的讲座教授，两岸三地（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学术论坛上的重要活动家，跨华、英两种语言著述领域新作不断的学者，自身工作的繁忙可以想象，但一旦承诺了复旦大学的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之岗位，就以如此精力投入经营，苦心扶植、提携后学。我作为协助他工作的合作者，愿意把这种感动公布出来，不仅仅是为了表彰，更重要的是，德威兄为当代学术界确立了一种人格风范，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在德威兄的带动下，许多海外的青年学者与复旦的联系也紧密起来，由此展开了多元的校际交流和系际交流，复旦中文系先后与美国的威斯理学院、华盛顿大学生路易斯分校等学院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学者的往来逐年增多。多年来，复旦中文系一贯执行鼓励研究生外出深造的方针，许多在美国攻读学位的复旦学子脱颖而出，他们始终与母校保持了亲密联系，随时交流、参与复旦中文系的各种活动。他们在海外做出的学术贡献，同样也显现了母校的根基培育之果。

这几年里，复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同事们一如既往地发奋著述，在积极展开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视野渐宽、新见频发，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三年中，除了个人出版的学术著作以外，我们还先后

编辑出版了复旦师生现代文学研究的集体成果《薪传》丛编四种，国家社科项目《20世纪文学史理论创新丛书》五种，都反映了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整体风貌的学术成果。自德威兄担任了复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以来，我一直想再策划一套新的学术丛书，扩大原来著述范围，以体现跨国合作的广阔视野，反映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新的学术面貌。于是，我冒昧提出一个“平台”的理念。平台一般只是指高于附近区域的平面，一个广阔、但有范围的空间，现在常用在比较抽象的学科建设领域，指的是某种学科发展的空间，如学术机构、学术活动、论坛、刊物，等等，供学术成果的公开发表和展示之用。依我的理解，丛书本身不是平台，而是在德威兄引领风气之下，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空间扩大了，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国际交流和学术会议，由此又引出新的讨论话题和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整体的学术发展过程都体现了“平台”所展示的实绩。

新的平台丛书目前还只是一个设想，要实现这个设想恐怕还要好几年的时间。我们不打算事先策划什么主题，只想提供一个平台，吸引更多的著作者来自由加入。作者的队伍有所扩大，不仅仅是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同仁，也包括在复旦中文系学习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包括曾经在复旦中文系学习过、而今在各自岗位从事研究的学者，还包括从复旦到国外去留学攻读学位、而今在海外高校里工作的学者，也包括在复旦中文系兼任过各类教职、上过系列课程的海外汉学学者，在一个比较宽泛的角度来体现复旦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丛书的内容和主题设计方面别无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必须是新完成的学术著作，而不是旧著的重版或变相重版；时间上也没有特别催促的意思，希望成熟一本推出一本，慢慢的积累数量，渐渐的形成规模。

2007年，在《薪传》丛编出版时，我写过一篇序，文章中说：“希望将‘薪传’作为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学术研究成果的总称。……传统就是一道水流，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水底的石头，传统的水流浸漫我们，滋润我们，又带走了我们生命中的信息，传布开去。复旦

现当代文学学科是由前辈学者辛苦开创而成，我们应该发扬光大其传统，继往开来，代代承传。所以，‘薪传’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关键词。”现在，我把这套平台丛书同样纳入“薪传”系列，也就是想再强调一遍：薪传，是我们的关键词。



2010年11月10日临晨，
写于香港城市大学德智苑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人民艺术家”与自由作家	5
第一节 一份新史料	6
第二节 老舍加入“美国作家联盟”是秘密的吗?	11
第三节 自由和作家	14
结语	18
第二章 老舍的自杀与其基督教信仰	21
第一节 老舍的基督教经历	22
第二节 老舍文本中的基督教	27
第三节 “舍予”+基督=“赴死”?	34
结语	45
第三章 从老舍之死看其幽默与悲剧意识	47
第一节 老舍的幽默观与写作——幽默的因与果	48
第二节 幽默与悲剧意识——因果的宿命	55
第三节 老舍之死是对生命的幽默	68
结语	69
第四章 “文革”:知识分子的人格炼狱	71
第一节 政治运动中的老舍	72
第二节 “老舍式”的批判	83
第三节 口述史下的历史身影	90
结语	95
第五章 1949年后知识分子的“另类”抉择	97
第一节 陈寅恪:“另类”的绝响	98
第二节 老舍之外的其他自杀者	107
第三节 历史就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	114
结语	118

第六章 历史:一种特殊的记忆	121
第一节 “卢梭式”的忏悔反思	122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卢梭身影	132
第三节 唯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140
结语	145
附录	149
1. 赵清阁致韩秀信	150
2. 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舒庆春	169
3. 萧乾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	192
4. 萧乾与郭沫若的是是非非	205
参考文献	219
后记	225

导 论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对“耶稣受难”的“记忆”的描述，勾起我对“老舍之死”的“记忆”及其命运选择的思考，并再一次确信，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重新建构的。而被唤起“记忆”的人们，“在每个历史时期分别体现出来的对过去的各种看法，都是由现在的信仰、兴趣、愿望形塑的”。^① 换言之，人们为了使他们的个体记忆和他们当时的所思所想达到同步，要时不时地修改个人记忆。

“老舍之死”像哈布瓦赫的“福音书”一样，既再现了每个人的个人记忆，又再现了受访者群体共同持有的记忆。虽然从导致老舍之死的1966年，“八·二三事件”的发生，到这些记忆获得一种集体形式，甚至到我做口述实录之前，其间只经历了并不算很长的三十几年时间，但也不应认为在这期间只会发生微不足道的变形、差误和遗漏。相反，在一个值得记住和描述的事件发生后，直接目击者的在场反而会更易使事件的某些面貌被改变，以致更难确定其特征。

事实上，正像对于耶稣的生活及其死难时的情形，哈布瓦赫的“福音书”仅仅再现了门徒们的部分记忆一样，我的口述史采访也仅仅是亲历者或目击者们对于导致老舍自杀的直接外因“八·二三事件”历史“情形”的“部分记忆”。但不管怎样，这部分记忆是构成“老舍之死”的基础。而参与这个历史文本叙事的群体，距离这个事件越是遥远，就越有可能对其所保存的意象进行润色粉饰，加以重塑和完善。

“人们希望让耶路撒冷成为基督教关注的中心，因为那里是上演耶稣受难的剧场。从耶稣的故事中保留下来的最重要的情节是

^①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他的死亡和复活,就仿佛他的整个一生、整个一生的全部意义都凝聚在‘圣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之内了。”^①老舍又何尝不具有同样的意味?北京市文联、孔庙、太平湖,是“上演”老舍受难、殉难的“剧场”,而老舍一生最复杂又最具悲剧意味的“情节”,似乎就是他的自杀,好像他整个人生的悲剧宿命,都凝固在了1966年8月23日前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

记忆所具有的性质是,“当记忆无法恢复与产生它们的现实之间的联系,从而无法获得更新时,记忆也就变得贫乏而凝滞了”。^②正因为此,我试图以口述史的方式,将尽可能多的与“老舍之死”相关的“记忆”,努力做成一页“活”的遗产,而非仅供陈列的历史标本,由此多少可以显示出老舍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选择的一个侧影。

记得法国小说家昂利·司汤达在《昂利·勃吕拉传》中表述过一位试图重新体验自己前30年生活经历的自传作者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他做出了许多发现……它们像墙上壁画的一些巨大的碎片,被遗忘了,很久却突然又出现了,而且在保存完好的这些碎片的一侧留有很大空隙,只能看见墙砖。原先壁画上的石膏已经调落,那个壁画也已经不复存在。其实,这也是“老舍之死”所有受访者共有的“经验”。但会有多少人认真想过,人类生活的丰富性依赖于我们记忆过去的能力;又会有多少人想过,并像司汤达一样痛苦地意识到,我们的记忆是有选择性和脆弱易变的?“老舍之死”的口述历史,不正是由许多“记忆”的碎片而重新建构起来的一幅历史的“壁画”!尽管碎片很多,空隙很大,却可以从中窥视出一些历史清晰而真实的痕迹,在这样的痕迹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选择也得到多元、立体的呈现,即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选择作为一种特殊的记忆在历史中立此存照,从一些具有典型意味的历史事件或个案中,梳理出哪怕一点点清晰的线索,以今天之自我设身处地去进行历史的感悟和探索,并反观对照今天的现实景况,分析如果知

①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

② 同上书,第179页。

识分子的“学术”身体一旦从属于“政治”，学术是否就会随之变成纯粹“政治”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指出：“人们对艺术的认识永无止境，总有新的东西尚待发现。面对伟大的艺术作品，似乎每看一次便呈现一种面貌，它们似乎跟活生生的人一样莫测高深，难以预言。那是它自己的一个动人心弦的世界，有它自己的独特法则和它自己的奇遇异闻。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已经了解了它的一切，因为谁也没有臻于此境。”^①英国作家卡莱尔说：“历史是一真实预言的手稿，任何人都不能充分解释。”^②我也不想在本书中过多“解释”什么，只想像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所说：“每一部真实的历史都必然会通过它对于事件的具有人性和生命力的表述，促使我们记起，过去既是像现在一样活生生的，又是像将来一样捉摸不定。”^③

本书共分六章，前三章从“老舍之死”来挖掘揭示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人民艺术家”与自由作家的老舍的双重性，并由此反观它的自杀与其基督教信仰，重新审视他的幽默与悲剧意识；后三章则以“老舍之死”为切入点，反思老舍及同时代一些知识分子作家的命运选择。

① [英]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导论》，范景中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6页。

② [英]卡莱尔：《记历史》，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7页。

③ [英]屈维廉：《历史女神克利奥》，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31页。

第一章 “人民艺术家”与 自由作家

第一节 一份新史料

在文学史中,被冠以“人民艺术家”^①荣誉的老舍,与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作家老舍,两者之间似乎不仅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甚至两个身份是截然对立的。然而,放在历史的视角之下进行审视,会发现两者其实是在同一个老舍身上得到了和谐统一。这尤其意味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那个在许多人眼里常常意识形态化了的“人民艺术家”,并非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自由作家。换言之,长期以来,倒是“人民艺术家”把作为自由作家的老舍遮蔽了。

《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看北京市文联这个裴多菲俱乐部——北京市文联1949—1966.5.大事记》(以下称《大事记》),标明“初稿”,16开,54页,铅印,封皮已退成浅蓝色,下方注明“北京市文联《向太阳》革命造反兵团编”,时间1967年8月。这是一份难得的新史料。

开篇首页红字印刷着两段“最高指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员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① 据我在坊间听到的尚未得到文献证实的一段口述历史:当话剧《龙须沟》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以后,周恩来授意周扬由文化部来表彰老舍,并以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但遭到大批来自延安的革命作家的反对,认为老舍刚从美国回来,1946年去美国以前一直待在重庆,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文人,更何况比起他们来对革命也是寸功未立。后周恩来将此事告知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彭真说,让我们来表彰他,因为他写的是北京的事儿。龙须沟是北京的沟,治理龙须沟是北京市政府的决定,我们来授予他称号。因此,老舍获得的“人民艺术家”称号,就是非国家级而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了。

艺术，却不热心提出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翻过页，是落款为“北京市文联《向太阳》革命造反兵团总部”的“几点说明”，明确说明“这个《大事记》，选择了北京文联十几年来的重大事件，包括以前在文联工作过现已因各种原因调离的一些人的部分言行，和现在文联编制之内的人在未调进文联以前的某些重要言行。这个《大事记》，侧重选择了文联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部分事例，因为篇幅所限，而对广大工农兵群众及文联广大干部和群众跟黑线进行的抵制和斗争则描述不多”。还强调指出“这个《大事记》，只是个初稿，一定会有重要的疏漏，甚至错误”。今天看来，只涉及老舍的内容，就真的存在“重要的疏漏”。也正是这个“疏漏”，使我们有可能反向推论老舍对“自由”有着一份执著的精神坚守。

从这份以编年形式编写的《大事记》本身看，锁定的“批判斗争对象”主要是三部分人，即“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因此，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而非主要“斗争对象”的老舍，里边提及的文字并不多，全部摘录，也只有以下 15 条：

1. 1950 年，“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老舍在美国出卖他的《骆驼祥子》，混到 1950 年回国。彭真、周扬、李伯钊等人视为珍宝，安排在北京市。老舍也抓‘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他大写太平歌词‘文章会’。他的口号是：‘再没有比成功再成功的了。’就是说只要成了名成了家，就是好样的。十足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哲学。同时，他在迺兹府买下房子，招兵买马，大肆拉拢。三教九流，无所不用其极。后来把一些人安插在文联及所属团体中”。(第 2 页)

2. “3 月间，卖国主义电影《清宫秘史》出笼。……后来，廖沫沙又示意老舍写‘戊戌政变’，屡经翻改最后以反动剧本《茶馆》出笼，为封建主义唱挽歌，为旧社会招魂。”(第 2—3 页)